Co-China 周刊

NO. 185

2014年12月26日

刘达临：性文化与与孔孟之道 | 潘绥铭、黄盈盈：21世纪中国人的“性之变”与“性恐慌” | 荐影：中国古代传统性文化大观



编者的话

12 月 18 日，学者李银河在博客发表文章《对所谓拉拉身份曝光的回应》，坦言与自己相恋 17 年的伴侣为生理女性、心理男性的跨性人（transsexual）。虽然长期以来她都在做着常被称为“出格”的事情以促进中国社会的性多元化，此举依然引起众多质疑甚至非议：这是否违背中国传统的“性道德”?

进一步的问题是：中国社会是否潜藏着很多这样的性少数群体？中国人的性观念是否已经发生了大变迁？2014 年最后一期月末版 Co-China 周刊，我们尝试梳理中国传统的性观念及其变迁，作为“回望传统”系列的收尾。

谈到传统文化，很多人会将其与“性”对立起来，认为那是传统不能言说的禁忌，或是有悖传统伦理之事。刘达临从传统文化的代表——孔孟之道出发，考察中国传统的性文化与性观念，提出：孔孟之道承认性是人的本性；“礼”代表中华性文化文雅、温柔的特点等。潘华在总结了中国古代性文化的特点之后也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古代传统性观念并没有想象中的极端、禁欲。江晓原更是在《中国人性观念的演变》中，直接指出“古代中国人曾有非常坦荡的性观念”。

换个角度，在西方人看来，中国人的传统性观念是怎样的？Richard Burger 关注中国政治意识形态在性观念方面的引导，给出的答案是“没有哪个社会有中国这样戏剧性的变化，从极端开放到道貌岸然的假正经，再到如今的暧昧气氛。”

既然中国传统的性观念并非极端封闭、保守，那么经历了历史的变迁，它在当代的表现如何？80 年代初，婚外恋、性教育、婚前性行为、离婚等等话题就曾引起过社会大讨论。2000 年以来，木子美性爱日记、换妻聚会、各种嫖娼卖淫案件、少女怀孕、援交、忠贞联盟、贞操女神等等，无时无刻不在挑拨着中国人的神经。当下，“约炮”兴起，陌陌等手机应用暴露中国年轻一代的性观念。潘绥铭与黄盈盈通过调查婚外性行为、商业性行为、青少年的性等议题，为我们呈现 21 世纪中国人的性之变和性恐慌。

改革三十年，中国在婚姻和性方面的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是否在经历“传统淡化”？一项由国内外学者联合完成的研究指出，中国人对婚前性行为看法变化大、对婚外性行为有较高的容忍度，传统和开放共存，正处于观念变化的模糊时期。另外，德国之声曾于几年前采访此次事件的主角李银河，她认为中国当下性文化的发展只算是处于西方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性革命的初期阶段。

回顾中国传统性文化和性观念，我们得以消除“传统”与“性”之间的对立；追溯性观念的变迁，进而审视当下，则让我们得以管窥中国传统文化在时代浪潮中的更新。中国人的“性之变”，背后其实就是一幅庞大的传统观念更新的图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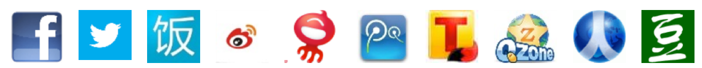
因下周出刊日（1 月 2 日）正逢元旦假期，Co-China 周刊休刊一期，祝读者们新年快乐。



目录









【传统】

刘达临：性文化与孔孟之道


刘达临，上海大学社会系教授

“ **性文化决不应该是从传统文化中游离出来、和儒家文化相对立的东西，而中华性文化应该是在儒家文化中吸收了很多营养，才能发展，二者应该有相辅相成的一面，而且这一面应该是十分重要的，这样思考才合乎逻辑。** ”

孔子是“至圣先师”，是在最正统的社会、代表最正统的学问的最正统的人物，对我们来说,仁、义、礼、智、信，哪一方面不能研究，偏要从性的方面来研究孔孟之道，这岂不是亵渎圣贤，太“左道旁门”了？

主要指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好像就是和孔孟之道划等号的，是和封建礼教划等号的，而鲁迅说过封建礼教在杀人，巴金的《家·春·秋》更使人形象化地了解了封建礼教是怎么杀人，于是，儒家文化、孔孟之道就变成中华性文化、性文明彻头彻尾的对立面，变成摧残人性的一个主要根源。我研究性文化，在所撰写和出版的许多著作中，都是这么阐述儒家文化、孔孟之道，从性文化的角度来看儒家文化，儒家文化似乎都是一些历史的消极面，这种理解对吗？我们讲传统文化，我们说中国有丰富悠久的文化，传统文化是历史遗产，是好东西啊！尽管其中有糟粕，有消极因素，但是精华还是主要的，不然中国人还有什么可为老祖宗而自豪的呢？性文化决不应该是从传统文化中游离出来、和儒家文化相对立的东西，而中华性文化应该是在儒家文化中吸收了很多营养，才能发展，二者应该有相辅相成的一面，而且这一面应该是十分重要的，这样思考才合乎逻辑。

可是，我没有继续思考下去，长期以来，我把这个问题挂起来了。写文章，做讲演，往往也引用几句“食色性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之类的话，说明孔孟之道并不是一开始就搞性禁锢，可是是不是又以摧残人性、扼杀自由的面目出现呢？就模糊起来了。

时光跨入了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初，环境的变化使我有许多新的思考了。这些变化主要是：

在中国大陆，这几年间掀起了一股国学热，讲《论语》、研究孔子、研究儒家文化的书出版以百万计，而且成为电视节目的主要内容之一。2004 年 11 月，中国的第一所海外孔子

学院在韩国的首尔举行了挂牌仪式，迄今为止已有 249 所孔子学院分布在了世界上的几十个国家和地区。我国教育部还着手在全球建立 100 所孔子学校，使孔子的智慧传播得更远。

国际上对孔子的评价也越来越高，较普通地认为，孔子、苏格拉底、释迦牟尼和耶稣是人类历史上的四大圣哲。法国曾把孔子的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写入宪法，定义为自由的道德界限和公民义务的原则，有人说，把外国先哲的格言写入宪法，这是第一例。1988 年 1 月，历届几十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巴黎集会，谈到 21 世纪人类需要什么思想才能维持和平共存时，最后达成的共识是孔子思想，他们说：“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 25 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2005 年 9 月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会议上获准设立“国际孔子教育奖”，主要用于奖励在教育、文化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专家，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最高级别奖项，也是第一次以中国人的名字在联合国设立的奖项。

以上这些评价都是世界少有的，作为中国人，我深深地感到自豪，可是作为一个性文化研究者，我又感到困惑。儒家文化、孔孟之道历来是作为摧残人性的封建礼教、作为性文化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如果它是这么违背人性的健康发展，又怎么能流传千古，又怎么能在世界上都受到赞同与称颂呢？

于是，我和胡宏霞博士就开始研究孔子、孔孟之道以及儒家文化了。当然，我们在这方面的基础是不够的，也不可能以全部精力来进行研究，中国造诣很深的孔子专家实在太多了，要赶上他们殊非易事，我们只是性文化专家，而不是孔子专家，我们只能从性文化的角度来研究孔子，剖析孔子，剖析孔孟之道，探索性文化研究中令人困惑不解的问题，使中华性文化在历史上扎根更牢。

在这个研究过程中，我们对孔孟之道越来越有兴趣了，而且感到对中华性文化的理解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性文化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不是在真空中发展变化的，中华性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能逆主体文化而行，而且在很多方面受到了主体文化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是：

1、孔孟之道起初还是比较开明的，它承认性是人的一种本性，如孔子说过：“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孟子》当中说：“食色性也。”这都是我们至今还经常引用的。

2、孔孟之道所提倡的“礼”，是中华性文化的特点之一。

我们进行一些世界古代民族的性文化对比研究，发现中华性文化决不像古希腊那么浪漫，不像古罗马那么放纵，不像古印度那么神秘，不像古代日本那么粗鲁，而是很讲“礼”，最典型的话就是“床上夫妻床下客”，“娘子，小生这厢有礼了”。对性的态度则是“温、良、恭、俭、让”，连在文学方面的性交描述，春宫画中的性交描绘都是那么文雅、温柔与含蓄，和其他民族的性文化有很大的不同，不能不说是受了儒家文化的很大影响。



儒家文化很提倡“礼”、“仁、义、礼、智、信”，这是为人处世的重要原则，“礼”就是一种规矩。现在流行的说法是封建礼教扼杀了人性，压迫了人性，可是儒家最初提倡的“礼”却是有它的很大合理性的。夏、商、周是中国从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最初阶段，在野蛮时代，上下关系、男女关系以及人与人的交往，很多方面都是无矩可循的，所以一些大圣大贤们把“制礼”即制定规矩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周公旦就是这么一个人，他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后人甚至把夫妻过性生活就称为“行周公之礼”。周公是孔子所崇拜的精神偶像，到了春秋、战国，群雄纷争，天下大乱，“礼崩乐坏”，孔子非常着急，极力提倡“克己复礼”，倡导人与人之间要有一套行为规范以约束自己，以调节人际关系的和谐，稳定社会秩序，这是有很大的合理性的，因为它是一种社会需要。这和封建后世所倡导的封建礼教不完全是一回事，扼杀人性的封建礼教丢掉了“礼”的合理内核，使“约束”走向极端，就完全变成了谬误了。性的约束在任何时代、任何条件下都是必要的，现代所倡导的“性文明”，归根结蒂也就是两个内容：“健康的自由”加“合理的控制”。自由反映出人性的需要，但是自由并不是为所欲为，而要健康；控制，或云约束，反映出一种社会性的需要，对于性以及人类的一切行为，社会都要加以控制，但是不能像封建礼教那样控制，控制要合乎人性，要合理。

3、孔孟之道十分提倡“中庸之道”，这也大大地影响了性文化，而且也是历代的中国人立身处事之本。直到现在还是如此，尽管不一定这么提。中国人很讲究“过犹不及”、“摆摆平”，讲究“均衡”，这都是“中庸之道”。中国人很讲究处理问题要在相对立的两极中找到一个平衡点，不久以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说，这种“中庸之道”也是他所推崇的一种治国之方。“中庸之道”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华性文化，性文化有“禁锢”与“放纵”的两极，我们总是要根据各种相关条件的变化，在这两极之间找一个最合理的平衡点。中国的古人提倡“欲不可无”、“欲不可绝”，同时又提倡“欲不可早”、“欲不可纵”，这也是一种“中庸之道”。

4、孔孟之道非常讲究“礼”，讲究规矩，但是同时又强调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并不僵死，反映到性文化上，也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例如，孔孟之道提倡“男女授受不亲”，有人就问孟子，如果嫂子掉在河里要淹死了，可以不可以“援之以手”呢？孟子说，“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而援之以手，权也。如果眼睁睁地望着嫂子被淹死而不去救，禽兽也。这就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又有人问孟子，“逾东墙而搂其处子，则得妻”，“不逾东墙则不得妻”，那么爬墙头去找女人可以吗？这种做法是完全违背“礼”的，违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可是孟子回答，娶妻是件大事，如果没有老婆就没有后代了，这是个大原则，如果不爬墙就找不到老婆了，那么这么做也是可以的。

5、最初的孔孟之道中有许多合乎情理、闪耀着人性的光辉的东西，但是，被后世的封建统治者利用了，篡改了。例如刘邦刚当上皇帝时，他的麾下帮他打天下的那些功臣都不守君臣之礼，叔孙通劝他要推行孔孟之道，这一套做法很有效，于是刘邦也去祭孔了。朱元璋

有一次读《孟子》，读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句话时，大为震怒，把孟子的塑像从孔庙赶出去，后来又把《孟子》删改了。这都体现了封建统治者的意志，用实用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孔孟之道。为了迎合统治者的意志，一些自封为“孔孟之徒”的学者也篡改了孔孟之道，例如宋代中期的“程朱理学”所提倡的“存天理，灭人欲”就是为巩固封建统治秩序服务的，孔子提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而“程朱”却要“灭人欲”，要人们不要为自己的自由、幸福而斗争。“程朱理学”的一些代表人物生活上、气节上也十分虚伪、丑恶，违背了孔孟之道。因此，五四运动、鲁迅等批判的“吃人的旧礼教”、“孔家店”等已经不完全是原来的孔孟之道了，而是把原来孔孟之道中闪耀着人性的光辉的内容删除了，把一些消极因素扩大到了荒唐的程度。

在历史上，孔孟之道经历了一个被推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全盘否定、现在又被重新推崇的过程。但是我认为有偏差。有人建议党和政府在第 77 代“衍圣公”孔德成去世后要继续册封“衍圣公”；有的地区要以孔孟之道来治理，搞复古的一套，而且大大神化了孔子，这真是 21 世纪的怪现象。中国人有个毛病，一推崇某个伟人，就容易把他神化。实际上，任何影响历史的伟人，也都有他的时代局限性和社会地位的局限性，不能无限夸大。从性文化的角度看，至少可以肯定，孔孟之道中“设男女之大防”，“男女授受不亲”、“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是一些对社会有负面影响的东西，不能照搬。我们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有两个来源，一是中国国有的传统文化，二是西方文化，对这两种文化都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并根据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对一切文化都应该这样，对孔孟之道也应该这样。

所以，我今天这个发言的主要目的是：

1、进一步认清中华性文化的源头，理顺性文化和中国两千多年来主体文化的关系。

2、要充分挖掘孔子学说中肯定人性、发扬人性的内容，挖掘那些被历史淹没了的东西，还孔子以真面目。

3、对封建礼教是要批判的，但是不要批错了人；推崇孔子是对的，但是不要神化，不要迷信。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潘华：中国古代性文化的特点及其在近现代的发展

> **中国古代性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和演化对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近现代性文化的发展表现出与古代性文化的发展大不相同的特点，这是由中国近现代所处的时代特征所决定的。性是许多中国人尽力想回避但事实表明是回避不了的问题。**

众所周知，人类的性行为是生理因素和文化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所谓生理因素，就是指人类性的自然性，或曰动物性；所谓文化因素，就是指社会各成员的特殊行为模式，包括其语言、习俗、智力以及艺术和物质等方面的成就。人类的性欲是与生俱来的，到了青春期而发展，不可消灭，不可改变，这是人与其它动物的一致性所在。人类性行为的文化因素是在后天习得、形成的，因为人是社会化的动物，文化是社会对人施加的影响。由此可见，性文化即是指人们以何种方式满足性欲，以何种方式来表达性的兴趣和性的情感，以及对性的认识水平等等(刘达临：《性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第 4 页)。

从古至今，从中至外，许多人认为性只是个人行为，而且是“言之羞也”的私事，不能把它和社会发展联系起来，但是现代科学的发展使这种认识发生了改变。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序言》中说，人类社会和历史的发展的决定因素有两个：一是物质资料再生产，一是人的再生产。人靠物质生活以维持自身生存，靠性繁衍后代，人类社会正是通过这两种生产不断得到延续和发展。那么性是怎样影响社会的呢？首先，性通过影响人口而影响社会，人口过少或过多都对社会发展十分不利，社会必须采取相应措施调节人们的性行为从而控制人口的规模；其次，人能否以正确的态度对待性问题以及在性方面得到自由和幸福的程度影响到社会的安定，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国家的兴亡。

一、中国古代性文化的特点

第一，中国古代性文化和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关系特别密切，它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而发展，随着政治、经济的衰微而衰微。唐代是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发展的鼎盛时期，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性文化空前繁荣的时期。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唐代的市妓达到了空前繁荣的程度，这是因为当时国力富强，统治阶级对性的控制比较宽松，社会风气比较开放；



民众富庶者较多，有些人“饱暖而思淫欲”；经济的繁荣使城市发展，流动人口增多，从而增加了临时性的性需要，而商品经济造成两极分化，有些贫家女卖身，从而又能在市场上满足这种需要。同时，统治阶级的享乐腐化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社会。市妓的繁荣促进了性文化的发展：唐诗全集中有四分之一是描写妓女生活的；当时涌现出许多才华出众的妓女，比如宫廷舞妓谢阿蛮，宫廷歌妓许永新、念奴，身怀绝技的音乐家张红红等等。宋朝中期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走下坡路，于是性也逐渐变得保守、封闭起来，儒家的禁欲主义逐渐限制了性学的发展，这种现象困扰了中国人七八百年之久。宋明理学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明清时期更是把性小说当作“禁书”。

第二，中国古代性文化具有强大的溶合力。唐代由于政治、经济的空前繁荣发达，在各方面都实行比较开明、开放的政策，在学术、宗教和文化等方面兼收并蓄，出现了一个文化艺术百花齐放、多姿多彩的时期。当时中外贸易和外交往来频繁，中外文化交流空前发达，中国固有的文化和中亚、印度以及其它国家的外来文化融合在一起，成为统一的中国文化。这种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融合力，在以后一千多年内，少数民族虽然在军事上一度占领中原，实行野蛮的统治，但是包括性文化在内的中国文化总是能够融化他们，改造他们，使他们的性道德、性风俗、性制度走向一个较为文明的阶段，元朝蒙古族的统治和清朝满族的统治便是很好的例子。

第三，古代中国人提倡“中庸之道”，这种态度也渗透到性文化的许多方面；相对于古代西方人而言，古代中国人以较为含蓄、优雅的态度对待性问题，比较讲究含而不露。古代中国的任何一个朝代都没有出现过古罗马时期那种全社会淫乱，也没有出现欧洲中世纪对同性恋的残酷惩罚和对“女巫”的虐杀现象。在夫妻性生活方面，古代中国人较多赞成“床上夫妻床下客”，而不主张夫妻过分亲昵、“轻狂”。以嫖妓而言，许多古代中国男人把和妓女建立一种无拘无束、朋友般的关系放在第一位，而把发泄性欲放在第二位。中国古代一些高级妓女以其高超的文化艺术素养使人为之颠倒，其次才是卖身。

第四，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基本理论是“天人合一论”，这也是中国古代性学即房中术的一个理论基础。古人认为人是融化于宇宙的万物之中的，男女的性结合正是宇宙二元自然力相互作用的一种表现。古人还认为天地的变化(比如风雨、雷电、寒暑等)会对男女性交、受孕产生很大的影响，而男女性交又会影响风调雨顺和吉凶祸福。“天人合一论”的观点不仅贯穿于中国古代哲学以及道教和儒教的教义之中，也贯穿于中国古代房中术的理论以及古代的许多性风俗、性习惯之中。

第五，古代西方人常在纵欲和禁欲这两个极端之间徘徊、摇晃，即通过纵欲以追求一种过度的、甚至畸形的快乐，而禁欲又把性的功能只限于生殖上。可是在古代中国，人们除了强调性的快乐功能和生育功能以外，对性的健康功能也十分强调，这就是所谓的“房室养生”。在汉、唐之间，人们更讲求性的养生之道，生育的内容次之，而到了明、清，求嗣、



得子等等才占更重要的地位。古人把养生作为几千年来所反复强调的一系列的性交方法和注意事项的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他们坚信性交除了繁衍后代以外，还可以滋阴壮阳，使人强身健体，延年益寿。与此同时，古人在性医药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第六，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延续的时间很长以及小农经济长期占统治地位，人们十分重视婚姻和家庭的巩固以及子孙的繁衍。在儒家所倡导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条中，“齐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因为“家之不治，何以天下为？”在这种情况下，“家丑不可外扬”就成为一种普遍守则。也正因为这个缘故，男子即使在家庭中得不到性的满足，也不会轻易地拆散自己的家庭，而是到外面拈花惹草以求补偿。同时古人对子嗣也看得很重，他们往往把有无子嗣看成是家庭是否完美的表现，对此的重视程度甚至超过夫妻关系的和谐。子嗣众多，人丁兴旺是最值得夸耀的地方，而“断子绝孙”则是一句最恶毒的诅咒。在古人看来，子嗣众多不仅增加家庭乐趣，不仅使自己“老有所养”，不仅使自己的私有财产后继有人，而且是对列祖列宗要尽的最大责任。因此，如何繁衍后代，如何优生，也成为中国古代性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第七，和巩固婚姻、家庭和繁衍子嗣密切相关的是对妇女贞操的极端重视，这在宋代中期以后尤其突出。在古代，中国人不像西方那样提倡坚守“童贞”，只“嫁”给基督，而是主张“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可是女子必须“从一而终”，只能和自己的丈夫一个人发生性交关系，如果夫死再嫁或者因其它任何原因和其他男子发生性交关系，都被认为是“终生之耻”，“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夫死守节或以身殉夫被认为是女子的最高美德，政府给予褒奖， 而这一切都是从巩固夫权制的家庭、确保子女出自丈夫的血统出发的。从宋代中期以后，开始提倡女子缠足，到明、清两代则已蔚然成风。女子缠足以后行动不便，不能离家远行，只能呆在家中侍候男子；同时，三寸金莲还可供男子把玩，“昼间欣赏，夜间抚摩”，发挥着“性工具”的作用。女子缠足这种性畸形现象是中国所特有的。

第八，在文学艺术方面，性具有很大的反弹作用。中国古代的性文学、春宫画可以追溯到很久远的年代，但其成果不突出，找不出多少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然而它们到了明、清两代却达到了一个巅峰状态。众所周知，明、清两代是中国历史上对性禁锢得最严酷的时代，那么为什么性艺术却能有大的发展呢？其实原因也不难理解：一是因为当时世道衰微，世风日下，加上“蛮族”入主中原等原因，许多有才华的读书人无意走仕途之路，于是放荡不羁，游戏笔墨，聊以自娱，在这方面唐寅(也称唐伯虎)便是个典型的代表人物；二是性是人类的一种自然需要，在强大的禁锢力量的作用下，这种需要会产生一种反弹作用，以另一些方式释放出来，虽然这只是一种消极的反抗。

从中国古代性文化的以上几个特点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性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一座文化宝库，虽然其中有一些糟粕需要我们加以扬弃，但更多的宝贵遗产需要我们加以汲取。探索这一重要的、特殊的又往往被人视为神秘的文化的发展轨迹，对我们的社会发展是大有裨益的。



二、中国性文化在近现代的发展

1840 年开始的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同时也标志着包括性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进入了全面的、剧烈的和根本的变迁时期。从以上的描述中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性文化具有很强的溶合性，这种溶合性在近现代表现为对外来性文化的不断吸收、借鉴和消化。从大体上看，近现代中国性文化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鸦片战争爆发到满清王朝灭亡（1840－1911 年）。在这一阶段中，中国古代性文化不断受到外来性文化的冲击并开始走向瓦解。中国封建制度的腐朽到了清代已经达到了顶点，人性被严重的压制，一切进步的思想和行为都要被扼杀。从太平天国到戊戌变法，人们一直为社会进步、民众的自由幸福而斗争，也包括为性的自由幸福而进行的斗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洪仁玕在其施政纲领《施政宪法大纲》中首次提出了有关婚姻自由的规定，这表明先进的中国人已经开始学习和借鉴西方的先进思想和文化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进行批判和改革。在戊戌变法中，以康有为、谭嗣同为代表的维新派进一步提出了反对压迫妇女主张。康有为从理论上批判了“存天理，灭人欲”唯心主义理论，他从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出发，把人欲的正当性、合理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充分肯定人追求幸福、快乐的道德意义，对杀人不见血的封建贞节观进行了尖锐地批判。维新变法运动的另一位大无畏的斗士谭嗣同在其代表作《仁学》中，提出了反对把男女两性关系神秘化，反对动辄称“淫”的说法。他认为正是由于存在着对性的神秘感和种种忌讳，两性关系的混乱才像洪水猛兽般不可阻挡。谭嗣同还深刻揭露了妇女在社会与家庭中所受的压迫和歧视，把批判的矛头直指“三纲五常”和女子贞节观。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传入和兴起打开了中国近现代性文化变革的阀门，为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准备了一个前提条件。

第二个阶段：从辛亥革命到蒋家王朝的灭亡（1911－1949 年）。在这个阶段，封建性文化继续着毒害国民，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所掀起的一次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运动不断把这一腐朽文化推向死亡的深渊。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提出了“人权”和“科学”的口号，提出确立新道德，反对旧道德，反对人吃人的礼教。鲁迅首次提出了中国男女的性禁锢与性苦闷，并指出性是人的本能，是不可压制的，对本能的压制只能导致病态，导致中国人心理上的变态，即性行为隐蔽化，往往以“意淫”来满足。他对当局以及一些道学家实行的禁欲主义和性压制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并极力反对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对妇女实行性压迫的畸形现象，多次尖锐地批判中国几千年来所形成的不平等的男女两性关系以及由此构成的性道德观念。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又掀起了“新思潮运动”，即不断引进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继续进行无情批判，其中的卓越代表就是被称为“性博士”的张竞生。张竞生以改革社会为己任，提出研究性科学，实施性教育以及改革社会的一系列主张，并身体力行，在艰难与曲折，非议与打击中屡败屡战。张竞生

在其倍受非议的代表作《性史》中提出了许多新的性学思想，诸如：性是自然的、合理的，人们不应该回避，而应该大胆地去享受；男女的平等也应该表现在性上的平等；提倡恋爱自由、婚姻自由甚至性交自由；两性关系应以爱情为基础，而爱情是可以变迁的等等。和中国历史上的许多仁人志士一样，张竞生最终“壮志未酬身先死”，但他所开创的事业将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承认和传续。

第三个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 30 年（1949－1978 年）。在这一阶段中，性文化表现出了种种新的气象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也走过了一段曲折的路。新中国建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采取了一系列与性有密切关系的革命措施：反对封建礼教，提高了妇女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上的地位，主张男女平等、夫妻平等，反对对女子的任何压迫和剥削；颁布了《婚姻法》，提倡婚姻自由，反对包办婚姻和买卖婚姻；查封一切妓院，严禁买淫嫖娼等等。正如共和国曲折的发展道路一样，建国后性文化的发展也走过了一条曲折的路：在建国以后一段很长的时间内，提倡集体主义和艰苦奋斗，否定人们应有的快乐与享受，从而形成了新的禁欲主义；50 年代末兴起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更是企图拆散家庭，实行男女分居，完全背离了人的正常自然需求和社会需求。“防修”、“反修”的“左”的思想使建国后的性文化在取得发展进步的同时又向后倒退了一步。

第四个阶段：实行改革开放以后（1978 年至今）。在这个阶段中，党中央通过“拨乱反正”和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使社会经济发展重新步入正轨，也为性文化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契机，同时随着国门的打开和思想的不断解放，一些腐朽的封建性文化沉渣泛起，西方资产阶级一些肮脏的性文化也开始腐蚀一部分国民的身体和心灵，有关性的问题不断涌现。在这个时期，千百年来的性禁锢被完全打破，尤其是到了九十年代，性也不再是一个隐秘的问题和肮脏下流的事情，性学研究开始登上科学的殿堂，性教育已经普及到了中学的每个课堂，人们已经认识到性是自己享受生活的一种权利，自己是性的主人。可是，在解决旧问题的同时新问题又产生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人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同时也使庸俗趋利主义和享乐主义在社会上蔓延。有些人，特别是一些青少年受到西方性文化的腐朽思想的影响，走上了性放纵的道路，单纯地追求性享受，性的自然性压倒了性的社会性，在社会上造成了不少性紊乱现象。在中国的性禁锢、性保守还没有被彻底肃清时，性放纵的苗头已经出现并呈愈演愈烈之势。中国的性文化是否将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是人文社会科学工作不得不严肃对待并进行深入研究的问题。

三、小结

中国古代性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和演化对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近现代性文化的发展表现出与古代性文化的发展大不相同的特点，这是由中国近现代所处的时代特征所决定的。性是许多中国人尽力想回避但事实表明是回避不了的问题。这一问题能否得到有效的解决由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经济发展水



平决定，同时它也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反作用。当代的中国社会正处在急剧的、全面的转型期，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互激荡，中国的性文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态势，有好的，也有坏的。为了实现中国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我们必须对性文化发展中所出现的新问题、新气象引起高度重视并对之进行深入的研究。

参考书目：

①刘达临：《性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②刘达临：《20 世纪中国性文化》，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江晓原：中国人性观念之演变



江晓原，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教授

“

在许多当代读物中，古代中国人的性观念常常被描绘成阴暗的、不健康的，特别是充满禁欲主义色彩的。一句“封建主义社会”如何如何，就将众恶归于古人。这其间实有绝大的误解。从先秦时代到今天，中国人的性观念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很有点象完成了一个轮回----当然更稳妥的套话是“螺旋式的发展”。

”

性观念是一个直接关系到人们身心健康的大问题，不适当的性观念严重损害人们的心理健康——接下来当然也就损害生理健康。性观念又是一个继承性很强的问题，陈旧的性观念经常顽固地盘踞在现代人头脑中。

在本文的篇幅内详细讨论中国人性观念之演变这样的题目是极为困难的。本文只能谈一些大致的结论和线索，如果读者有兴趣进一步追根问底，可参阅最近出版的拙著《性张力下的中国人》(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新版：《云雨：性张力下的中国人》，东方出版中心，2006)。

古代中国人曾有着非常坦荡的性观念

在许多当代读物中，古代中国人的性观念常常被描绘成阴暗的、不健康的，特别是充满禁欲主义色彩的。一句“封建主义社会”如何如何，就将众恶归于古人。这其间实有绝大的误解。从先秦时代到今天，中国人的性观念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很有点象完成了一个轮回----当然更稳妥的套话是“螺旋式的发展”。

在文明发展史上，性规范有一个逐渐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上古之时，先民刚从野蛮状态过渡而来，性规范方在若有若无之间，与此相对应的性观念自然也非常“开放”和无忌。但是在华夏文明进入成熟阶段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社会流行的性观念一直是非常开放和富有现代色彩的，这一点却是现代人通常不容易想象的。

古代中国人是重视人欲中的性欲的。“食色性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些著名的先秦古训，正反映了这一点。如果我们肯耐心研读孔子、孟子的“原著”，就会发现

儒家哲学本来绝不是禁欲主义的，相反却非常重视人欲的满足——后来的宋明理学家虽然无不自称孔孟之徒，其实却是孔孟的不肖之徒。

从先秦两汉直到隋唐盛世，中国上层社会中的性关系一直是非常开放的。《左传》中记载着春秋时代各国贵族们的“通”——打趣来说，即古代中国贵族版的“廊桥遗梦”也——至少十六次，几乎每一次都有声有色，有的还酿成国际风波。不妨拿卫灵公和他的夫人南子为例，以见一斑：南子是那时有名的风流贵妇，连孔子去与她会晤了一次，都会引起弟子的不悦，孔子不得不指天划地自誓清白。卫灵公对于夫人的风流韵事却不仅不恼火，而且还玉成其事，他竟不惜亲自为夫人和她的情人——宋国的宋朝——安排欢会。不料卫太子出国执行外交使命路过宋国，受到宋国人的嘲笑，一怒之下回来要杀南子，卫灵公拉着夫人的手逃上高台，下令惩罚太子，太子只好逃亡到宋国去。

春秋时是如此，战国时也无不同。孟尝君可以在得知自己夫人与门客有恋情时坦然处之，秦宣太后可以就在自己的遗嘱中要不要让情人殉葬接受朝臣的意见。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唐代在两性关系方面更为开放，贞操观念淡薄。诸如未婚少女私结情好、有夫之妇另觅情人、离婚改嫁等事，在正史和笔记小说、传奇故事以及诗文中留下了大量事例。

宋明理学所鼓吹的妇女“从一而终”、“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节烈”(夫死不嫁曰节，殉夫而死或为抗拒婚外性关系而死曰烈)之类的观念，大抵在公元十世纪之前的中国社会，是根本没有市场的。相传宋人见到史书上记载汉、唐公主再嫁之事，大为惊奇，认为不可理解。其实中国古代女子夫死再嫁或离婚改嫁都是很常见的。随手就可以举出一大堆例子：

汉景帝王皇后之母臧儿，先嫁王仲，生一子二女，再嫁田氏，又生二子。王皇后是她长女，本来已嫁金王孙，且已生一女，后来臧儿听了算命的话头，相信女儿要大贵，竟再将女儿从金家夺走，献给当时的太子，即后来汉景帝。王皇后为汉景帝生下了大贵之子——赫赫有名的汉武帝。汉武帝即位之后，还亲自到长陵小市将自己那位同母异父的姐姐接

回宫中相认，丝毫不以自己母亲和外婆的婚史为耻。

千古风流的卓文君与司马相如，也是在卓文君寡居之后才相恋成婚的。苏武出使匈奴被扣押，妻子误以为他已死，也再嫁。骆俊被袁术杀害，其妻再嫁华歆。刘瑁死后，其妻再嫁刘备。袁熙之妻，即非常有名的大美人甄氏，在袁熙败亡后嫁给曹丕，曹植《洛神赋》的传说故事就是围绕着她而起的。孙权的徐夫人，原是陆尚之妻，陆尚死后嫁给孙权。孙权的两个女儿，丈夫死后都重新结婚。还有著名的蔡文姬，先为卫仲道妻，卫死后她被匈奴掳去，左贤王夫人，和左贤王生儿育女；后来曹操将她赎回，再嫁董祀为妻。



汉武帝时的平阳公主，夫死之后“与左右议长安中列侯可为夫者”，左右一致推荐当时“富贵振动天下”的大将军卫青，平阳公主虽有些顾虑，因为卫青未发达时曾是她的家奴，后来还是嫁给了卫青。

在上面这些事例中，娶了寡妇或再婚妇女的都是上层人士，其中有四位还是帝王，而他们根本不要求女子从一而终。

古代中国人性观念之坦荡开放，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表现：由于将男女之间的性满足看成天经地义，看成是光明正大的、极其美好的事情，所以古代中国人对于性交一事的私秘性，完全不象现代人那样重视。例如，根据古代不少文艺作品中的描写，以及传世的古代春宫图中的描绘可知，古时中国人常常在有侍女、丫鬟、朋友等旁人在场的情形下交欢作爱。而且即使在禁欲主义的宋明理学盛行数百年之后，这一习俗也并无改变。这一点曾使不少西方汉学家感到难以置信，然而放在中国传统性观念的背景之下就不难理解。

从坦荡到阴暗

今人常说“程朱理学”，朱即朱熹，程即程颢、程颐兄弟，都是北宋时代的大儒。下面是一则对于理学家来说非常有象征意义的故事：

二程一日赴某士大夫家宴会，座中有两位歌妓(大致相当于今日的三陪女郎)劝酒，程颐一见，立刻拂袖而去，程颢则仍与众宾客尽欢而散。次日二程见面，谈到昨日之事，程颐犹有怒色，程颢却笑道：我昨日在那里，座中有妓，心中原本无妓；你今日在这里，斋中无妓，心中却还有妓。程颐不觉愧服。

在文学上，这个故事给后人留下了“大程心中无妓”的典故。但是这个故事的意义，并不在于说明那位首倡“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程颐之严于律己，或程颢之处世圆通，而在于开始以一种道学的眼光、一种禁欲主义的标准来看待男女关系和性。因为在唐宋时代，歌妓劝酒娱客、演唱助兴，在官员和士大夫中原是极为普遍之事，参加这样的宴会本来不会招致任何道德方面的非议。

在这方面朱熹也大有“贡献”。例如，他有一部《诗集传》，是通过为《诗经》作注的形式阐发他自己的道学观点的。可是《诗经》这部连朱熹自己也相信是经过孔子删定的儒家经典中，竟然有至少 22 篇——都是优美的爱情诗歌——被朱熹斥为“淫奔之辞”。对于《郑风》中那些反映女子追求男子的篇章，朱熹更是深恶痛绝，斥之为“女惑男”，是“几于荡然无复羞愧悔悟之萌”。汉唐时代坦荡开放的性观念，在道学家们看来是不可想象的，是难以容忍的，故有“脏唐臭汉”之说。

理学在宋代的兴起有着非常复杂的背景，宋儒鼓吹的理论也有多方面的内容，但是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要点之一，就是对“男女大防之礼教”的大力提倡。此后这些观念逐渐深入



人心，封建集权统治者又动用行政手段来加以鼓励，比如明太祖下诏：“民间寡妇，三十以前亡夫守制，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这就不仅有精神鼓励，而且直接对家庭产生经济利益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道学家逐渐成功地将这样一套观念强加给中国人，那就是：女子必须从一而终，否则就是下贱而可耻的；男女之间的性爱是丑恶的，除了传宗接代不得已而行之，应该尽量压抑、回避和谴责性爱。之所以说这套观念是被强加的，是因为大部分人并非由衷地接受这套观念----这套观念根本就是反人性的，要大部分人由衷接受是不可能的。人们只是迫于舆论的压力，不敢公开表示反对而已。

对于这套禁欲主义的道学观念，既不敢表示反对，又不愿意接受和实行，那么出路何在?当然只剩下一条路，就是虚伪----表面上赞成、甚至大力鼓吹禁欲主义的道德标准，行动上则照样追求和享受性爱、欣赏乃至创作色情文艺作品、甚至嫖娼狎妓。好几百年以来，许许多多中国人就是这样生活的。正是这种禁欲主义的舆论和虚伪的传统，普遍造成了人们阴暗而病态的性观念。

二十世纪的震荡

随着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走向穷途末路，，中国人经历了欧风美雨的冲击，性观念开始发生剧烈变化。这种变化在都市人群中表现最为明显。

都市生活的展开，新式教育的兴起，使得男女之间必须发生频繁的交往，“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光景再难重现。许多男女抛弃了女子从一而终的旧道德观念。受过新式教育的青年为了逃避父母包办的婚姻而离家出走，是二十世纪初期经常发生的故事。这些青年通过自由恋爱寻找他们自己的爱人。

与上述现象相呼应的，是一部分文化人，在反封建的大旗之下，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自己的言行成为在性观念方面改革开放的先锋。例如鲁迅和郭沫若都有不止一次的婚姻，有的放到今天来看，也不无可议之处，甚至是不合法的。新旧交替之际，人们一时无所适从，有时也就容忍了某些过激之举。

这一时期还有更为过激的行动，足以考验今日中国人的想象力。例如，1927 年，在武汉曾举行过裸体游行，口号是“打破羞耻”，另一说是为了欢呼北伐胜利。两次这样的游行被当时的某报诋为“为世界人类开中国从来未有之奇观”、“真不异百鬼昼行之世界”。周作人表示不太相信真有此事，又说即使真有，“也只是几个谬人的行为，没有多少意思，用不着怎么大惊小怪”。又如那时激进的青年人还搞“天体(即裸体)运动”和自由同居。这些行为自然遭到卫道之士的痛斥，也不可能得到广大群众的认同。



随着西方现代性学知识的传入，为了让性学取得科学的“身份”，并且成为可以进行研究的学问，先行者曾作过代价惨重的尝试。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当推原北京大学教授、留法哲学博士张竞生。张竞生提倡节育、发表“爱情的四项定则(爱情有条件、爱情可比较、爱情可变迁、夫妻为朋友之一种)”时，社会尚能容忍；等到他编辑出版了《性史》一书，却立刻成为千夫所指，连最能容人的北大也容不得他了。张竞生当时任北大“风俗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该委员会当时搜集民间淫秽歌谣并编辑出版以供研究，未曾招来什么物议；张竞生认为性风俗也在应该研究之例，故有《性史》之作，不料物议沸腾，几乎所有当时激进的、以反封建名世的新派学者都不能接受他的作法，更不用说保守派了。

《性史》初版仅印 1000 册，张竞生作序，书中收有“一轲女士”的《我的性经历》、“小江平”(金满成)的《初次的性交》等数篇文章。“一轲女士”即张竞生当时的夫人褚问鹃。《性史》问世之后，不法商人仿冒出版其所谓“续集”至十集之多。张竞生为此付出了身败名裂的代价。尽管他一再说明、辩解乃至忏悔，却长期不能得到世人的谅解。他所讲论的“第三种水”，原是指女性在性交过程中达到快感高潮时射出的爱液，本意在说明性爱技巧之重要，也长期蒙受“淫秽”恶名。

1949 年之后，本来有着提倡更为健康、更为科学的性观念的极好契机，可惜因左的观念——反映在性的方面就是禁欲主义的观念——日渐盛行，局面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向封建道学家们的理想境界回归。改革开放之后，这才拨乱反正，性观念的发展重新走上正确轨道。不过几十年的折腾，后果极为严重，我们仍然不得不在极低的水平上重新起步，这只要看一看下面的一个例子就不难领会：

从 90 年代起，国内一些大城市的广播电台开始播出有关性知识的夜间成人节目，如“悄悄话”、“夜半私语”、“今夜不设防”之类。绝大部分人都认为这在中国是改革开放后的新产物，笔者起先也是这样认为的。然而最近因偶然的机会，才发现原来早在 30 年代的上海，那时的电台广播中已经有了这样的节目，题为“夫妇之道”；而且还出版了与这一节目相配合的书，观其内容，实与今日的节目大同小异！

但是近年来中国人在性观念、性心理方面的进步，毕竟是非常迅速的、是能够令人满意的。对此我们也举一个富有象征意义的例子来帮助理解：

1988 年，北京自然博物馆曾筹办“人之由来”展览，却因上级领导的意见而受阻，据当时《光明日报》的报道，领导的意见共三条，其中两条是：一、一张两性拥抱的照片必须拿掉；二、在从猿到人的过程中，必须写上恩格思的“劳动创造了人”这句话。从中不难窥见八十年代某些领导对性的看法之一斑。而到了 1994 年底，同样是在北京举办的“1994 全国性健康教育展览会”，情况却有了惊人的改观，

1994 年 11 月 20 日的《科技日报》有如下报道：

94 全国性健康教育展览会在开展 44 天之后，于 11 月 10 日圆满闭幕。说其圆满，首先是展览会没有受到来自任何方面的道德指责，其次展览期间没有出什么问题，顺顺利利。

这次展览会的举办是成功的。能够……将与性有关的 400 多幅照片、107 块专版及 30 盘录像公开展出播放，能够让有“性交姿势与体位”、“如何正确对待手淫”、“女性性敏感区----G 点”等内容的图文展版堂而皇之地挂在展厅，这本身就说明了人们思想的解放。……展览期间，有 7 万人主动来接受健康的性教育，有 1100 多人勇敢地坐在咨询专家的对面，探寻自己平时绝难开口的性问题。

与六年前的事两相对比，反差何等明显----如今连性交姿势与体位、G 点之类都可以介绍，连录像都可以播放，六年前却为了一幅两性拥抱的照片就不能开展。短短六年，“弹指一挥间”耳，中国人在性观念方面的进步是多么迅速。而且，这次展览是由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卫生部、全国科协等九家单位联合举办的，是国内第一次由官方举办的性知识展览，其意义自然非同小可。

就总体而言，目前大陆中国人在性观念方面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已经不是冲破禁区的问题，不是解放不够的问题，而是如何进一步科学化、合理化和人性化的问题。对此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每一个公民都自觉地参与。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James T. Teddy：中国性观念的前世今生



James T. Areddy，华尔街日报记者

“

虽然有了很大进步，在性方面中国仍然很保守。我敢说，大多数中国父母，在这方面对自己的孩子守口如瓶。甚至有的父母让孩子自己到街上或是什么地方自己找答案。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

Few human activities remain as ripe for study today as they did at the dawn of Chinese culture 5,000 or so years ago. But sex is one of them, and it’s the focus of a new book that peeks into the bedrooms and brothels of the world’s most populous nation.

现代人的行为不像 5000 年前中华文明初露曙光时那样有研究价值了，但性是个例外，而且有一本关于这个主题的新书，这本书带我们一窥第一人口大国的床笫与妓院。

Released last month, “Behind the Red Door: Sex in China” (Earnshaw Books) examines how a culture born in concepts of yin-yang balance has fared against powerful forces like Mao Zedong and the Internet. Like many things in China, finds first-time author Richard Burger, sex is somehow different than in the West.

上个月出版的《红门背后：性在中国》（Earnshaw 图书）向我们展示了有着阴阳平衡概念的传统文化与毛泽东和互联网的较量。Richard Burger 在他的处女作中发现，与中国的许多事一样，这里的性与西方有点不同。

Mr. Burger, 58 years old and now based in Phoenix, is best known in China for his decade-old blog Peking Duck. Though he originally intended for it to serve as an online travelogue, Beijing’s heavy-handed reaction to the 2003 SARS outbreak energized him to focus Peking Duck on the country’s political and social structure.

Burger 先生，现年 58 岁，家住凤凰城，因他的有十多年历史的博客“北京烤鸭”而闻名。他本来只是打算做一个关于旅游见闻的博客，北京对 2003 年 SARS 笨手笨脚的反应促使他把“北京烤鸭”的焦点放在政治与社会结构。

It’s a big job to survey sex in China, where aspects of ancient culture (Confucian doctrine, silk curtains, concubines) echo in modern society (Communist censorship,



online dating, divorce detectives). “No society has swung more dramatically from extreme sexual openness to prudish orthodoxy and then to the sexually ambiguous atmosphere we see at present,” writes Mr. Burger.

调查中国的性是项大工程，它涉及到传统文化（儒家学说、丝绸窗帘、小妾）与现代社会（共产主义审查制度、网络交友、婚姻侦探）的交织。Burger 先生写到：“没有那个社会有中国这样戏剧性的剧变，从极端开放到道貌岸然的假正经，再到如今的暧昧气氛。”

In probing dating, marriage, homosexuality and promiscuity, Mr. Burger tracks down sexologists and prostitutes for their input. But “Behind the Red Door” isn’t voyeuristic. Instead it draws on fabled sources lik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and news coverage of notable junctures, like Beijing’s first sex shop in 1993, a confessional blog launched by a woman known as Muzimei in 2003 and the 2010 closure of Chongqing’s Hilton during a crackdown by Bo Xilai (who last month was expelled from the Communist Party in part because of “improper sexual relations” with multiple women).

在调查约会、结婚、同性恋、乱交这些问题的时候，Burger 先生征求了性学家和妓女的意见。但《红门背后》并不是一本窥阴的书，它引用了大量虚构的资料，比如《红楼梦》；同时也引用了关键时刻的新闻报道，比如 1993 年北京第一家性用品商店，2003 年木子美的忏悔博客，BO2010 年关闭重庆希尔顿酒店（BO 上个月因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关系被开除出党）。

Sex and deception emerge as a running theme in the book, whether it’s $300 hymen reconstructions to fake virginity, the large percentage of gay men marrying women to save face, or the seven tiers of prostitution — from ernai (“second wife”) to xiagongpeng (“down the work shack”).

在这本书中，性和欺骗是不变的主题，从 300 美元的处女膜修复手术，到大量男同性恋为了面子而与一个女人结婚，或者是 7 个不同层次的卖淫——从二奶到小工棚。

Mr. Burger spoke with the Journal about the Chinese sexual revolution and how the country is dealing with it. Below are edited excerpts from the conversation.

Burger 先生与本报聊了中国的性革命和国家如何处理的对策。以下是谈话的节选。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Why did you write this book?

华尔街日报：你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Mr. Burger: This wa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anything I’d done in the past. I’ve been an observer and always been fascinated, for instance, with the phenomenon of



prostitution in China, about gays in China, the sexual rituals that I saw that were very different from in the West.

Burger ：这与我以前做的任何事都不同。我曾经是个观察者，对——例如，中国的卖淫或是同性恋现象——非常着迷，这里的游戏规则与西方相去甚远。

If you look for books on the subject that offer us a survey from sex in ancient China to today, you’ll find there’s almost only the academic literature available, white papers, textbooks, so I thought this was a real opportunity to fill that gap.

如果你想看中国从古至今关于性的书，你会发现只有白皮书、教科书这样的学术资料可用，所以我有了填补这项空白的想法。

How does China’s sexual revolution differ from the West’s?

中国的性革命与西方有何不同？

The sexual revolution in the West was part of a much broader revolution for all sorts of personal freedoms. It became an atmosphere of “do your own thing” and “to rebel is good.” In China, the sexual revolution, it’s on the government’s terms to a large extent. You can only go so far. It’s not so much personal freedom, individual freedom, than a relaxation of the taboos about sex that have ruled China from the time of Mao and even earlier.

西方的性革命是范围更广的人身自由革命的一部分，它形成了“自己的事情自己搞定”和“造反有理”的氛围。中国的性革命，很大程度上政府说了算，只能到此为止。它与人身自由、个人自由相去甚远，只是一个对毛及其以前时代禁忌的放松。

How does the government influence sex culture?

政府如何影响性文化？

A good example of this is the telephone hotlines that I mention in the introduction. These phone lines for sexual counsel, they started in the mid-, late-1990s, and you would think, “OK, here are people calling in about sex and talking about their love lives.” And you might see this as liberating. But in fact, all of the counselors were government cadres, and the shows were sponsored by the government…it was all about strengthening the family.

我在引言中提到的热线电话是一个好例子，这些性咨询的热线电话，兴起于 90 年代中后期，你可能会认为：“这些打电话的人只是想谈谈性和他们的爱情生活。”但实际上，这些顾问都是国家干部，节目是由政府发起的，目的是为了家庭稳定。

Is dishonesty an important facet of the story?

欺骗是这个故事的重点吗？

It is, and it has to be, because China's in a tug-of-war against traditional Chinese values such as the wife being a virgin on her wedding night, a traditional Chinese belief. It's a tug-of-war between that and Western-style sexual openness.

确实是这样，因为中国处于传统价值观与西方观念的相持阶段，例如洞房花烛夜妻子必须是处女与西方性开放的矛盾。

Women are more frequently having sex with men who are demanding sex, but when it comes time to get married, they still have to prove that they're a virgin. They have to lie. They have to go to outrageous lengths, such as having a hymenoplasty operation.

女性更频繁地与有需要的男性发生关系，但要结婚时，她们仍然需要证明自己是处女。她们不得不说谎，以至于离谱到做处女膜修复手术。

How actively is pornography censored online?

网上对于色情内容的审查严不严？

I equate what they are trying to do on the Internet in terms of pornography as a game of whack-a-mole. They are always announcing these big stings. A couple of years ago the government announced they had shut down 60,000 porn sites and arrested 5,000 of the operators. One of them was even sentenced to life in prison.

我认为在网上对色情内容的应对措施与游戏“打地鼠”一样，政府经常宣布严打，几年前宣传说关掉了 60000 家色情网站，逮捕了 5000 名涉案人员，其中一人甚至被判无期徒刑。

What did you find about sex education?

你有没有找到性教育方面的内容?

In the early 1980s, sex education became mandatory for the first time. It had to be taught in the high schools. Most teachers are so squeamish that they either zip through it — these are biology teachers usually — they just hurry through it, or they skip it altogether.

80 年代早期，性教育第一次成为初中的必修课。大部分老师（通常是生物老师）太神经质了，他们要么一带而过，要么完全忽略。

What they do teach, when they do teach it, is about anatomy and biology. There's nothing about sexual morality. It's just taught as how reproduction works.

他们教的内容和时间都是关于解剖学和生物学，与性道德完全无关，只是关于如何繁殖。

China remains, for all the advances, very uptight about sex. And most Chinese parents, I would say, don’t teach their kids about sex at all. And some will even tell them that they found them under a rock or on the street somewhere. It’s such a sticky subject.

虽然有了很大进步，在性方面中国仍然很保守。我敢说，大多数中国父母，在这方面对自己的孩子守口如瓶。甚至有的父母让孩子自己到街上或是什么地方自己找答案。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One chapter is called “Shifting Landscape.” What’s shifting?

有一章是“改天换地”。什么在改变？

I start it off with the well-known story of Muzimei in 2003 writing her tell-all blog where she names names and described what they did in graphic terms. She was the first to gain attention who wrote about about sex, just for the sake of sex, and the joys of personal satisfaction with no strings attached. In fact, the government soon shut it down. But she had left an indelible mark.

我从 2003 年广为人知的木子美的故事开始讲起，木子美把名字和他们的所作所为用图片的形式在她的博客上全盘说出。她是因描写性受关注的第一人，为了性而性，没有其他附加条件。实际上，政府很快就把她封杀了，但她已经创造了历史。

She generated a new conversation about the role of women…that a woman shouldn’t feel guilty about having sex and that she should savor it.

她引起了关于女性角色的讨论，女人不应该因性行为而有负罪感，她们应该享受性。

We’re seeing a decided shift toward sexual liberation, but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a long hard slog before we see anything comparable to what we saw in the West, simply because, as we’ve said, traditional Chinese beliefs and values are playing a tug-of-war.

性解放将要迎来转折点，但与我们在西方看到的相比，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就像我说过的那样，中国的传统价值观还有影响。

Why does China have so many sex shops?

中国为什么有这么多性用品商店?

The sex shops aren’t about lewdness or about pornography. They’re about health.

性用品商店不下流也不色情，它与健康有关。

The thinking is just like the hotlines that a sexually satisfied population, a more contented population adds to the nation’s harmony. If you don’t have a sexually satisfied population, they’re more likely to question authority.

这些思考与热线电话一样是为了更多的人性福，人们越性福，社会越和谐。如果许多人都不性福，他们就要质疑政府了。

译文来自译言网，译者： liyang1986 ，原文来自《华尔街日报》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荐影：中国古代传统性文化大观

内容介绍：中国历史悠久，素以文明古国著称于世，于是不少人都有这么一种认识，似乎在中国古代一直实行性禁，和性封闭，而性科学则是完全舶来品，其实，如果我们好好研究一下历史，就会发现，中国几千年来有着相当丰富的性文化，有关的婚姻制度，房中理

论，文学艺术，道德观念、医疗卫生都经历了一个起步很早 、发展曲折的过程，而且时至今日，古代性文化对今天的人们还是有相当大的影响。

视频观看地址：

http://www.youku.com/show_page/id_zfd6952b8335411e196ac.html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荐书：Richard Burger 《Behind the Red Door》

RICHARD BURGER

BEHIND THE RED DOOR

SEX IN CHINA

A sexual revolution is underway in China. Traditional morals and behavior are being turned on their head as the country’s climb towards economic prosperity brings sex into the open. But it is a revolution distinctly different from the one experienced in the West and has taken unexpected twists and turns.



Written in a highly engaging and readable style, Behind the Red Door: Sex in China takes the reader on a journey from ancient days, when China's rulers relied on shockingly vivid Daoist sex manuals, to the present, where China is torn between sexual orthodoxy and Western-style openness.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荐书：江晓原：《中国人的性神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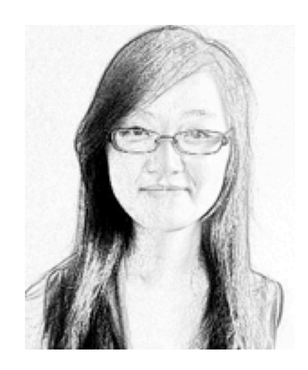


本书从中国人性观念的神秘主义特点这一角度，揭示中国人的特殊性爱观和中国人在落后的传统观念压抑下，人性的变态和性科学的扭曲。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变迁】

缪莹：传统淡化？当下中国的婚姻和性观念


缪莹，剑桥大学在读博士

> **研究者们认为这些结果表明：中国正处在观念变化的模糊时期。在他们所问的四个问题上，传统观念和开放观念并存。这和西方学者所提出的“传统淡化”理论相符合，因为传统在“后传统”（post-traditional）世界里并不会马上消失，而相反可能更加牢固。**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仅表现在社会经济等方面，更存在于人的观念中。其中尤其明显的，是婚姻和性方面观念的改变——尤其是在婚前性行为、婚外性行为、同性恋和性交易这四个一直属于道德禁忌的话题上。那么，是否中国也在经历西方学者所谓的“传统淡化”（detraditionalisation）呢？浙江大学和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CL）的六位学者就这个问题联合做了一番研究。

为了寻找比较全面的结果，研究者们在三个经济发达程度不同的省（浙江、云南、贵州）一共抽取了两百多名 20-39 岁的志愿者回答这些问题，其中 53%来自农村地区，55%是女性。

对婚前性行为的看法在几十年间变化最大：在 1990 年的一则研究里，有 73%的男性和 78%的女性认为处女贞洁是一个女孩最重要的财富，这个数字如今已经下降。研究者们发现，婚前性行为在当下中国十分常见。92%的农村居民和 94%的城市居民表示他们认识有婚前性行为的人。多于三分之一的人对此现象表达了负面评价：略年长者中 53%认为这是不好或不能接受的，略年轻者中则有 44%持有这种观点。在这个问题上，地域和男女差别都不大：在认为婚前性行为不妥的人群中，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各占 36%和 39%，男性和女性各占 39%和 36%。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当下接受婚前性行为的人群往往认为：只有在长期稳定交往、以结婚为前提的情况下进行性行为才是恰当的，他们大多并不赞成随便的性关系。

研究者们发现，人们对婚外性行为也持有较高的容忍度，这一点和世界上大多数社会不同：一般来说，外遇比婚前性行为更让人难以忍受。在这次的调查里，三分之一（32%）的参与者说他们认识已婚外遇人士，并有 49%的人不直接反对婚外性行为，甚至表示同情，尤其当夫妻已经不爱对方之时。尽管女性比男性更憎恨外遇（65%相比于 57%），也有一定数目的女性参与者认为：在婚姻里，男人的忠诚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经济能力。这意味着人们已经不再认为婚姻是实用的、为多方着想的，而更注重个人感受。

但是，尽管离婚、外遇等等逃离令人不满的婚姻的方式已经有增多倾向，结婚生子这个经历在中国却依旧是不可避免，更没有选择的——在这一点上，中国依旧十分传统。

相比之下，同性恋这个话题更加敏感。直到 2001 年，同性恋才不再被普遍认为是“精神疾病”，但它依旧不被社会主流接受。哪怕是理应更宽容的大学生，在这个问题上也十分保守：01 年和 02 年的研究表明有 57%-77%的大学生完全不接受同性恋。在此次调查中，有七位参与者说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同性恋；24 人说他们认识身边的同志，其中 18 人是城市居民；64%的参与者认为同性恋是不能接受的，农村居民和女性尤甚（72%和 71%）。不过，更为重要的是，也有 30%的参与者对同性恋表示了宽容和接受。不过，21%的参与者对和同性恋相处表达担忧，其中 13 名在表示接受的同时，认为自己不想和同志接触或交友。尽管这一观念也有了开放的倾向，但大多数人还是不接受自己身边的同性恋，同志们也常常被迫进入异性婚姻。

最后，研究者们发现：有将近一半的参与者表示他们听说过参与过性交易的男性。所有的女性对性交易皆表示不赞同，但表示反对的男性只有 80%。18%的参与者表示他们认识身边的性工作者，并且有三分之一的人对她们表示同情和宽容。研究者们还做出了这样的预测：在传统淡化的背景下，女性倘若能够继续独立，性交易这一行当将会逐渐衰落，因为不用付钱的性机会会很充分。

综上所述，研究者们认为这些结果表明：中国正处在观念变化的模糊时期。在他们所问的四个问题上，传统观念和开放观念并存。这和西方学者所提出的“传统淡化”理论相符合，因为传统在“后传统”（post-traditional）世界里并不会马上消失，而相反可能更加牢固。这些并存的观念恰恰符合传统淡化理论中重要的一点：在后传统社会中，新生文化的冲击会让相当一部分的人从传统的观念和行为中寻找慰籍。

【参考文献】

Weijun Zheng , Xudong Zhou , Chi Zhou , Wei Liu , Lu Li & Therese Hesketh (2011): Detraditionalisation and attitudes to sex outside marriage in China, Culture, Health & Sexuali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Research, Intervention and Care, 13:05, 497-511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潘绥铭、黄盈盈：21 世纪中国人的“性之变”与“性恐慌”



潘绥铭，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黄盈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

> **现代社会，“性”的变化为什么总是会吸引人眼球，容易引起那么多的恐慌？且不管西方如何、历史如何，至少不能忽视中国社会的急剧变迁对于“性之变”及其道德恐慌的影响。**

七年前，在越南举办的一次国际“性”研讨会上，越南某大学的一位女生跳起来“质问”我们：中国怎么会出来《上海宝贝》？中国的女人怎么了？中国人的“性”怎么了？语气中带着不解与气愤。

中国人的“性”，怎么了？这个问题一方面隐含着人们对于“性”（行为、关系、观念）的迅速变化的感知，另一方面，也表达着强烈的焦虑与恐慌。

中国人的“性”，怎么了？这是一个老问题。

80 年代初的时候，婚外恋（尤其是陈世美现象）、性教育（包括对自慰的讨论）、婚前性行为、离婚等等话题就引起过社会大讨论。99 年的《上海宝贝》是一枚重型炸弹，把美女作家们推向风口浪尖。接踵而来的木子美性爱日记、换妻聚会、各种嫖娼卖淫案件、少女怀孕、援交、忠贞联盟、贞操女神等等，无时无刻不在挑拨着中国人的神经。

那么，80 年代以来，中国人的性，实际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潘绥铭曾经从性行为、性关系、性观念、性的公开表达、女性之性的变化以及 LGBT（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的显性化等方面总结过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性革命”。性革命，既不等同于性解放或者性自由，也不等同于中国社会每个方面、每个人都在朝着性开放的方向变化。它是指，在一段比较短的时间内（主要指“文革”之后）中国社会和普通大众的性发生了一种整体上的迅速变化。这场性革命根源于由婚姻、家庭、生殖、爱情、社会性别与“性”共同组成的中国人的“初级生活圈”，在中国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所发生的变化。[1]

这样的认识来源于性社会学的诸多调查研究。尤其是，我们（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从 2000 年开始，针对中国成年人（包含流动人口）的性行为、性观念、性关系开展过

三次全国随机抽样调查（2000，2006，2010）。最近一次调查，除了包含 18-61 岁的成年人，还涵盖了 14-17 岁的青少年人群（包含校内外少年）。数据在方法、内容上具有可比性。[2]

性，涵盖着很多的内容，需要被分解了来讨论。下文仅列举被社会大众津津乐道的婚前性行为、婚外性行为、商业性行为以及青少年的性四个方面的调查数据，结合数据所表达的社会事实与社会层面的相关讨论，思考十余年来，中国人的“性之变”与人们对于这种变化的情绪反应及其背后的道德情感。后者在笔者看来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对于性的道德恐慌。

婚外性行为与“二奶”恐慌

婚外性行为，威胁的是婚姻忠贞、单一配偶制，相关的报道层出不穷，争论经久不衰。

我们的调查从“事实婚姻”的角度出发将其定义为：已婚或已同居一个月以上的人，在婚姻或同居期间，除了目前的配偶之外，还有其他性伴侣。婚外性行为，在男性中的比例，2000 年是 13.2%，2006 年是 8.5%，2010 年则上升为 28.9%。这个比例在女性中为：2000 年 4.5%，2006 年 6.7%，2010 年 9.7%。

从观念上看，三次调查的结果都显示有接近一半的人认为应该区别对待婚外恋现象（不是一棍子打死），在 45％左右的水平上持平。在 2010 年的调查问卷中，对于男人包二奶的现象，有 7.6%的女人和 13.0%的男人持有支持或者理解的态度，男女合计 10.3%；对于女人做二奶的情况，女性持支持或者理解态度的占 8.7%，男人占 13.1%，男女合计 11.0%。无论男人还是女人，对于“做二奶”的态度比对于“包二奶”还要宽容一些。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 21 世纪的中国，有 3％上下的夫妻明知道对方已经有婚外性却仍然没有离婚；还有大约 16％的夫妻怀疑对方可能有，也没有离婚。两者相加，到 2010 年的时候，中国现存的婚姻中有五分之一已经被婚外之性威胁到了。可是，这些夫妻们却仍然没有离婚！

这个数据寓意深刻。这究竟是中国夫妻对婚外性越来越不在乎了，还是由于婚姻越来越难于解除，迫使至少有一方不得不“忍为上”呢？究竟是他们学会了如何在猜疑之中相处，还是更加看重婚姻的其他非“性”的基础，还是他们仍然不肯或者还没有学会把离婚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之一？

与此同时，对于“包二奶”的现象，社会层面的恐慌近年来有增无减。随着婚外性行为的不断被曝光，再加上围绕着《婚姻法》的热烈讨论，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这种对于“夫妻双方相互忠贞”的背叛越来越威胁到自己的婚姻与家庭。也有人把这种恐慌扩延至社会的稳定与人类的发展。这种恐慌，严格意义上其实并不是指向性本身，而是婚姻与家庭的稳定（包括财产的分割）。婚姻与家庭的稳定，又被设定为社会稳定的前提。可是，婚姻与家庭的稳定一定（或者主要）是因为婚外性行为破坏的吗？或者换句话说，婚外性行为就一定会破坏婚姻与家庭的稳定吗？婚外性行为，违背了什么？婚姻的设置，由谁来规定？

婚姻，首先是为了社会的稳定还是为了个体的幸福？社会稳定是以低离婚率为必要条件的吗？

婚外性行为，可能有它的种种问题，但是其与婚姻以及家庭稳定之间的关系，进而与社会稳定之间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被想当然地“必然”化了。在道德恐慌之中，我们对于婚姻的想象，缺乏认识层面的反思，往往过度强调作为“社会设置”的婚姻，而无视“事实婚姻”的挑战，当然也无从分析“婚姻破裂”的主要原因及婚姻(包括离婚)对于当事人乃至社会的意义。

商业性行为与“失足妇女”

商业性行为，挑战的是性的神圣与性的私密，性是否可以被视为商品进行公开自由的买卖？卖淫嫖娼与色情业，被社会视为道德风向标，或者被视为禁忌、不予讨论，或者备受谴责。

我们虽然有十多年性产业研究的经历，但是没法回答“中国小姐之多少”的问题。从我们的定量调查数据看，男人找小姐的情况在近十年里没有太大变化，可谓稳中有涨：2000 年＝6.3％，2006 年＝6.1％，2010 年＝8.0％。

我们在调查中有两道题是检测人们对于卖淫嫖娼的态度：

“目前在中国，从事“性服务”的“小姐”，如果被警察抓住，最高罚款是 5000 元，同时拘留最多 15 天，还要通知家属。您觉得，这种处罚是太轻了，还是太重了？”

“目前在中国，如果警察抓住嫖客，最高罚款是 5000 元，同时拘留最多 15 天，还要通知家属。您觉得，这种处罚是太轻了，还是太重了？”

对于上述的两个法律规定，在 2000 年的时候还只有 15％上下的人认为是处罚过重了，可是到了 2006 年和 2010 年，这一比例上升到 25％上下，增加了 10 个百分点。也就是说，虽然中国人民以遵纪守法而著称，但是仍然有四分之一左右的人对于国家处罚卖淫嫖娼的法律持有不同的看法。

卖淫嫖娼，在最近的十年里，比例并没有很大的增幅（至少找小姐的比例保持平稳）。这一方面表明现行扫黄政策的失败，另一方面也打破了“如果不扫黄，嫖娼卖淫必然越来越泛滥”的假设与恐慌。“扫黄”的政策不仅无效，也不那么合乎“民意”。尤其是，当越来越多的性多数人群也意识到生活的艰难，当博士们都为自己的就业担忧的时候，曾经道德败坏、贪图享乐的卖淫女被改称为“失足妇女”，“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社会情感在增强。可是，虽然社会对于个人卖淫的宽容度越来越高，卖淫现象被赋予的道德色彩并没有因此而减少。“道德败坏论”（尤其是玷污妇女、毒害青少年）、“家庭破坏轮”、“文明破坏论”，乃至“导致腐败论”，这种种指责，虽然缺乏社会事实层面的论证与有力的逻辑推导，但是折射出社会对其强烈的道德恐慌。这种情绪的来源，在笔者看来，实际上是因为商业性行为极大地挑战了性的隐私性与神圣性，带来某些阶层对于性泛滥、性



低俗化的道德恐慌。商业性行为，也是人们为失败的婚姻、日趋嚣张的腐败、缺乏安全感的社会、失落的文明寻找的替罪羊与出气孔。

青少年的性与“救救孩子”

青少年的性，涉及性与年龄的关系，也涉及性与未来的关系。青少年，是性道德最关注、最想“保护”的人群。青少年，在性爱相关的问题上被贴上的是“纯洁”“无辜”的标签。担心青少年的纯洁会受到玷污是家长及社会反对性开放的重要理由。可是，这种“纯洁”与“玷污”，很大程度上是想象的，社会对于青少年的性，知之甚少。“救救孩子”的声音往往以忽略、掩盖孩子的声音为前提。

从我们的调查数据看，在 14-17 岁的少男中，2010 年，12.6%到 15.4%的人自报有过性交行为，在少女中，这个比例是 8.3%到 11.9%。[3] 在情感方面，33%的少男与 29.1%的少女有过单相思的经历，29%的少男与 23.7%的少女有过失恋的经历。目前承认自己已经有恋人的少男有 13.5%，少女 13.8%。如果再结合大学生的调查数据的话，我们会发现，在 2006 年，32%左右的大学生有过性交行为。而且，性爱经历并不会影响学习成绩。相反，学习成绩较好的学生、社会活动能力越强的学生，发生性行为的可能性越大。另外一个应该是更有意义的数据是：时至 2006 年，依然有近五分之一的大学生没有过与异性单独交往的经历。

在性观念方面，超过半数的少男少女们认为自己的性观念比较开放（或者非常开放）。在诸多性爱观中，比例最高的是认同“先有爱，再有性”（少男 71.8%，少女 79%）。认同比例比较高的性爱观还包括“性很宝贵”（少男 68.1%，少女 63%）。过半数的少男少女认为婚前性行为不算道德问题。对于 “包二奶”问题，超过五分之一的青少年对于“男人包二奶”、“女人做二奶”表示能够理解。少女中表示赞同的比例略高于少男。对于女性贞操，绝大多数少女很看重（6.1%认为没有意义），比例远远高于少男（22.4%认为没有意义）。

从数据显示的社会事实来看，青少年的性与爱，不管是行为方面还是观念方面，都呈现出了多元的特点：不是没有性爱行为，也不是所有人（或者大部分人）都有性爱行为。社会对于青少年之性的态度，一方面，无限夸大青少年中性的“泛滥”，谴责“性自由”的社会风气带来的坏榜样作用；另一方面，又过度强调青少年的性“纯洁”，在性教育的问题上战战兢兢，唯恐越雷池一步，教坏了孩子。不管哪一种，都不愿意正视青少年的性爱，不愿青少年的主体参与。家长们总是希望，在某个年龄之前，青少年是白纸一张；在某个年龄之后，他们马上可以牵手成功、性福快乐地结婚生子。殊不知，谈恋爱、性交往也是一种能力，也是需要培养与锻炼的。

反对青少年的性，道德说教与“防患于未然”的社会控制的意义大过社会事实。对于青少年的性恐慌，实际上折射着人们对于未来的担忧，甚至是对于人类发展的担忧。只不过，这种担忧很轻易地被转嫁到“性”的问题上。

婚前性行为与“贞操女神”



婚前性行为，挑战的是婚姻与性之间的先后关系，后者更为确切地说，涉及性是否具有独立性、是否需要以结婚为前提的问题。这是最近 30 年来中国大众最为关注的性现象之一。

我们的数据显示，在全国 18 到 61 岁的未婚总人口中，就是到调查的时候仍然没有领取结婚证的人里面，有过性交（无论跟什么人）的总计比例是： 2000 年为 37.7%；2006 年为 37.0％，基本持平；2010 年则显著地增加到 49.1％。注意，我们这里仅仅说的是发生过性交行为，而不包括其他更为宽泛意义上的涉性行为。

人们对于婚前发生性行为的宽容度在不断增加。尤其是对于那些在恋爱中跟对象发生了性关系，但是两个人后来又结婚了的现象，在 2000 年、2006 年和 2010 年，认为这不算是道德问题的人，都超过了一半，在 60％上下呈现为持平状态。

可见，婚前性行为，不管是行为发生率还是观念，社会的宽容度都是比较高的。这与社会大众的认识也是比较相符的。与前面提到的几种性现象不同，婚前性行为，虽然发生率越来越高，但是人们并没有恐慌感。婚前性行为，尤其是“先斩后奏”型（导向婚姻）的婚前性行为已经越来越合乎社会的情理。大学生贞操联盟、贞操女神之所以成为社会的热点，不在于她们契合了大部分人对于婚前性行为的反对情绪，恰恰相反，是因为在婚前性行为越来越被宽容的情况下，人们对于“居然”还有人跳出来宣扬女性贞操表示不解。“守贞”派虽然列出了很多“守贞”的理由，但这些理由与性所承载的很多罪责一样，往往缺乏事实论证与逻辑推理（比如把婚前性行为当作少女意外怀孕的原因，而不谈性教育的缺失；把婚前性行为当作青少年羞耻感的来源，而不谈这种羞耻感的社会建构），越来越多的守贞倡导者开始基于宗教信仰来反对婚前性行为。

性之变，我们为什么恐慌？

婚外性行为、商业性行为、青少年的性，以及婚前性行为，这四类性行为虽然都在变化，但是在中国社会的变化速度与折射出来的社会情感是不一样的。前面三类的发生比例远远低于婚前性行为，但是人们的恐慌要远远大于婚前性行为。因为婚前性行为威胁到的仅仅是性行为道德本身，这种威胁随着婚前性行为的普及而日薄西山。但是对于前三者的恐慌则更多的不是指向性行为本身，而是婚姻、家庭、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等等。

这种种联系跟 20 世纪初期社会对于恋爱、婚姻自由的恐慌、对于娼妓业的讨论何等相像！自由恋爱、自由婚姻曾经让社会感叹世风日下，担心因此而“乱套”，可是现在又怎么样？民国初年的妓女在民族抗争史上有着积极的地位与论述，但是随后，在同情怜悯的语境中，娼妓被描述为可能蔓延性病、败坏风气、搅乱社会秩序的无知基层女性，进而被建构为关乎国家的健康、民族进步的社会问题。这种建构我们并不陌生。“性”何以堪，有这么大的能量、该为婚姻、家庭、社会发展、人类进步这么多的问题负责？

现代社会，“性”的变化为什么总是会吸引人眼球，容易引起那么多的恐慌？且不管西方如何、历史如何，至少不能忽视中国社会的急剧变迁对于“性之变”及其道德恐慌的影响。



婚外性行为、商业性行为与婚姻家庭的破裂、社会的无序、文明的退步之间的“必然”联系并不单纯是思维逻辑的问题，而是因为相当一部分民众其实仅仅需要有人来为中国社会的道德滑坡负责，仅仅需要为伴随着社会疾速变化而来的焦虑与无措找一个替罪羊或者出气口，但是又绝不能指向任何本应对社会秩序负责的人。这种民众情绪也契合了相关部门运用道德优越性来巩固自身合法性的需求。因此毫不奇怪，“性”这个最能触及人们道德神经的问题，总会出现在几乎每一次社会热议的风口浪尖上。在这种种情感之下，小姐们、二奶们永远不会被承认是社会结构的受害者以及社会问题的结果，而是“必然”会被视为社会的“损害者”与社会问题的起源。[4]

从技术层面看，互联网的出现与普及对于性的公开讨论以及性的社会情感的形成就至关重要。卖淫嫖娼，只有现在才有吗？贞操女神，只有现在才出现吗？是有关这些问题在短时间内大规模的讨论现在才出现。互联网给了大家一个空间去展现，且容易放大某个事件的社会效应，建构这类性现象的公共色彩以及对于个体的临近感、威胁感。互联网，让大家看到了“与我不同的性存在”（或称性的异端），而且，更让人慌张的是，这些人居然还大张旗鼓地宣扬自己的存在，最不能容忍的是，“活得还挺好”。这是对于“多元”社会的恐慌。面对变迁社会中的性之变与性的多元化，“如果不---，大家都会---”、“如果每个人都---，社会就会---”的无前提假设与无限推论把处于性等级下层的各类性存在及其“恶果”无限扩大，人们对于违背某种社会规范的性行为的恐慌也随之放大。

“在性这个问题上，往往魔鬼学的成分比较多，性学（尤其是社会学与人类学）的成分比较少”。[5] 数据所表达的社会事实，不是唯一的、绝对的社会事实。但是，在对“中国人的性”捶胸顿足、唾沫横飞的时候，完全不顾社会学事实，只在“魔鬼学”（基于对个个案的无限扩大化想象与恶性推导）的基础上妄加评论，至少是欠妥当的。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数据本身只能表达这样的社会事实：某个时空中，中国人的“性”在不同指标上的整体变化趋势。如何解读这种变化，如何判断变化的方向与意义，如何判定某个百分比代表了“保守”还是“开放”，带来的是“欣慰”还是“恐慌”，则与意识形态以及处在某种具体社会情境中的读者（包括研究者）的价值取向有关。

“中国人的性，怎么了”？我们没有定论，有的只是更多的问题。我们也无法在旋飞的社会中为“应该怎么办”给出标准答案。但是，在性的问题上，希望多一些社会学与人类学的讨论，少一些魔鬼学的丑化；多一些分析与反思，少一些骂街与“必然”；多一份宽容，少一份压制。

最后，本文仅仅是在社会的层面上讨论性之变与性恐慌，并没有涉及性的政治意识形态与那些违背他人意愿、侵害他人权利的性存在。这三者不能混淆。本文也没有论及社会性别（包括男女，以及多元的社会性别）与性的阶层化问题，这两者在讨论 21 世纪中国人的性之变与性的道德恐慌时应该引起关注。



注

[1]潘绥铭，《中国性革命纵论》，台湾：万有出版社，2006。

[2] 具体方法介绍详见：潘绥铭、黄盈盈、王东，《论方法：社会学方法的本土实践与升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有关中国的性变迁，详见潘绥铭、黄盈盈，《性之变：21 世纪中国人的性生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年待出）。

[3]有区间的数值是我们在问卷中不同地方问了两次，如果两处都回答是，所得的比例是下限，回答了一处所得的比例是上限。

[4] 这种情感并不鲜见，也出现在很多国家的社会争论中。比如，有关卖淫的争论与伦理学探讨，详细可参考：何春蕤编，《性工作研究》. 中坜：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 2003；宁应斌，《卖淫的伦理学探究》， 台北：台湾社会研究专刊 14. 2009。

[5] 罗宾，“关于性的思考: 性政治学激进理论的笔记”，载于李银河主编，《 酷儿理论: 西方 90 年代性思潮》，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0。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德国之声：专访李银河：中国人性观念的变迁



李银河，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现在（中国人的性观念）进入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第三阶段，但也不是完全回到古代的那个起点，除了古代那种对性比较肯定的观念之外，还增加了一些新的因素，比如说现代性权利的观念，这在古代中国是没有的。现在有一些少数族群，比如同性恋，都在强调自己的性权利。我觉得中国现在是处于西方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性革命的初期这么一个阶段。”

提起李银河，人们总是会把她跟那些“惊世骇俗”的性观念联系在一起。她提出了“隐私、自愿、成年人”三原则，倡导宽容自由的社会环境，接受不同的性习惯、性嗜好。李银河还积极推动少数族群的权利，她三次通过各种途径向两会递交了同性婚姻提案。李银河目前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并出版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婚姻家庭、同性恋、女性研究等领域的学术著作。德国之声记者在北京采访了李银河。

德国之声：李老师，您好！您是研究社会学的，但是提起您，大家就说您是研究性学的。您为什么选择性学这个领域作为研究方向呢？

李银河：其实我的研究领域是婚姻家庭幸福与性，并不只是性。比如我现在做的中国家庭结构与家庭关系的变迁，（这是）我们正在做的一个（中国社科）院的一个重大课题。我前不久完成了一个农村性别权利关系调查，书马上要出版了。只不过跟性有关的研究，社会对它的关注度很高，比其他领域要多的多。你同样出一本书，要是研究性领域的，很多圈外的人会看，一般公众也会看；要是比如说出一本关于婚姻家庭的、性别研究的，一般就只有圈内的人看。同样都是学术研究，大家对性的关注度就比较高一些。

德国之声：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您就陆续发表了很多相关领域的研究报告。通过这些年的研究，您觉得中国人在婚姻家庭、性方面的观念以及行为的最大变化是什么？

李银河：观念和行为方面的变化都很大。可能最主要的（表现）还应当是比如离婚率上升比较快，婚前性行为比例增加，婚外性行为比例增加。



德国之声：一方面人们面临着这些发展和变化，但是同时社会似乎对这样的发展趋势并不赞同，甚至是持比较否定的态度。您怎么看待这种冲突？

李银河：社会观念肯定是受到了冲击。比如说婚前童贞这件事情，社会观念就跟形势发展冲突的比较厉害。中国几千年来都非常看重婚前童贞。在中国就出现过被逼卖淫的小姐选择跳楼，结果妇联还派人去慰问的现象，全世界也很少见由政府出面来表彰这种民间私人行为的。这个观念在中国是根深蒂固，比如说我们这一代人也都认为也是要求婚前保持童贞的。但现在的调查显示，婚前性行为的比例相当高，对这个观念冲击很大，大家心里很矛盾。尤其很多家长都是保持婚前童贞这样过来的，但是看见自己的孩子已经不保持婚前童贞了，心里就冲突的厉害。在大学好像也有人组织什么青春无瑕少女团之类的反对婚前性行为的团体，但是好像响应者寥寥，大多数人还是在发生婚前性行为。这里面应该说有代际的冲突，也有这个时代与古代传统间的冲突，还有不同价值观间的冲突。从现状看，保守和现代两种力量都很强大。

德国之声：相比其他的社会，您认为目前中国人的性观念处在一个什么阶段？

李银河：我觉得跟别的国家相比，中国的性文化跟它们很不一样。我把中国性观念的变化分成三段：古代的时候中国人对性实际上是肯定的，阴阳合和、繁衍后代，从来没有太多的负面评价；但是从宋明理学、后来清朝都比较禁欲，共产党执政的这三十年，也是禁欲反性的；现在进入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第三阶段，但也不是完全回到古代的那个起点，除了古代那种对性比较肯定的观念之外，还增加了一些新的因素，比如说现代性权利的观念，这在古代中国是没有的。现在有一些少数族群，比如同性恋，都在强调自己的性权利。我觉得中国现在是处于西方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性革命的初期这么一个阶段。

德国之声：西方上个世纪性革命时期强调性权利同时是伴随了对其他权利的要求，比如言论自由、种族平等。在很多场合，您都在强调说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性癖好、性方式的权利。您认为性权利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权利？

李银河：我觉得中国的宪法不用写公民有吃饭的自由，也不用写中国公民有性权利、性的自由，因为这种权利实际是包含在宪法中的，属于人身自由权，它跟言论自由权、出版权是一致的。而在现在很多涉性的法律中，比如现行的刑法中的淫秽物品法，却跟言论自由权有冲突。在美国，有女权主义者提出要求立法惩治淫秽物品，但他们跟中国角度不一样。中国是出于道德惩戒的角度来禁止淫秽品，他们是出于女权的角度，认为淫秽品是针对妇女的暴力，这应该说是比较偏颇的看法，因为淫秽品里绝对不只是针对妇女的暴力。比如虐恋中好多是针对男性的暴力，关于同性恋的也不是专门针对妇女的暴力，所以他们的立论就很有问题。有案例显示，这些女权主义者在地方上曾经告赢了书商，但是美国联邦法院却驳回了他们的要求，认为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淫秽品是属于言论，不是行动，



因为它是一种人类想像的产物，完全是属于言论自由。中国面临的情况是一样的。中国目前对那些制造和传播淫秽品的人判的比较重。但是我觉得这个淫秽品法是跟公民的性权利、言论自由权利相抵触的，有矛盾的。

德国之声：但是我们要考虑到这些淫秽品对未成年人的影响。

李银河：我认为这个应该利用分级制来管理。成年人还是有权利看（这些东西的），然后通过分级制来限制未成年人对这类物品的接触。由于没有有效的分级制度，出了好多事情，比如最近汤唯就因为在电影中的大胆演出被禁了，我觉得是很不公平的。在中国的出版物因为没有实行分级制度，所以都要向青少年看齐，必须是一个十三岁孩子能看的东西，我们成人才能看；如果一个十三岁的孩子不能看的东西，我们大人都不能看。

德国之声：在性权利上，您有一个观点，认为凡是在隐私的场所中，成年人之间发生的自愿性行为都是无罪无错的；凡是符合“隐私、自愿、成年人“这三个原则的性行为，人们就应该承认其合理性。但是您又是坚决地反对包养二奶的行为。包养二奶也符合您的三原则，为什么您又要批判这个现象？

李银河：我认为，作为一个公民，特别是作为一个单身的成年人，他/她的性权利应该是完整的。但是你如果结婚了，自愿进入婚姻制度，就会有另外一套规则来规范你了。我觉得作为一个单身人的权利跟进入婚姻制度的人的权利是不一样的。不能说进入婚姻制度以后，你的权利就不完整了，你仍然有性权利，甚至包括跟第三人发生关系的权利。但是，当你进入婚姻以后，就有一个忠诚的承诺，一旦你违反了这个承诺，婚姻法会来管你，但不是刑法来管你。我一再批评的都是用刑法来制裁这些现象。我觉得当你进入婚姻以后，你是自愿地放弃了自己的一部分权利，你选择只跟你的伴侣发生关系，这是一种婚姻契约的约束。应该说我的三原则是针对那些单身的，因为他们没有受到其他的一些约束。

德国之声：现在中国的很多大城市出现了不少大龄单身未婚男女。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中国的传统，但是出于各种原因，他们又不愿走入婚姻殿堂。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李银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经有统计数字显示，在中国终身不婚的人占当时中国人口的3.8%，这个比例应该是相当低的。现在有很多人不结婚，有可能是因为他们推迟结婚，以前人们二十多岁结婚，现在他们选择三十多岁结婚。还有可能是他们选择同居。此外，（现在）人们比较看重感情。在过去中国人人都结婚时，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前甚至可能没见面，双方感情的因素少，所以大家都结婚。但是一旦感情的因素重了，在没有找到自己爱的人时，有人就选择不结婚。持“不跟不爱的人生活”这种观点的人越来越多，这是一种比较现代的观念，跟中国古代的婚姻观不一样。中国古代婚姻里爱情非常的不重要。中国古代的那些爱情故事里，都是私奔，这是越轨的行为。其实即使是在现在农村里，两个人私自谈恋爱也是越轨的行为，一般的人都是通过介绍，然后双方见面，如果



条件合适就结婚了，多数还是这样。谈恋爱在农村来说还是挺越轨的。而在城市出现这种现象，正是因为很多人想谈恋爱了，想追求爱情了，觉得没有爱情两个人就没有生活在一起的必要。此外，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每个人都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女人不需要通过嫁人来让一个男人养着，在没有合适的人选的情况下，她完全可以选择独立生活。这些的观念都是很现代的。这种现象也证明了中国现代化和都市化的进程发生了。

德国之声：谈到农村，您认为目前在农村人们的性观念跟城市的差异大吗？

李银河：差异还是相当大的，我觉得农村中的传统形态还比较重。女人还是要嫁入男家，婚后男居制还是农村比较典型的一个特征：婚后女人进入男人家庭。而在城市里，一般都是“新居制”：两个人婚后单独出去住。区分传统家庭与现代家庭的很大一个标志就是婚后是以“亲子轴”为主，还是“夫妻轴”为主。目前中国农村还是以“亲子轴”为主，可是在城市里以“夫妻轴”为主，“亲子轴”为辅的这种家庭已经出现了，成为一种主流。

德国之声：非常感谢您接受采访！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信息图：当前中国的性观念

PERCENTAGE OF SOURCES FOR SEXUAL KNOWLEDGE IN CHINA

	Men	Women
Internet	29.3%	18
Practical experience	22.8	26.1
Books	15.6	20.6
Pornography	11.8	6.9
Conversation with friends	10.2	10.4
School	7.5	10.7
Movies and TV series	2.1	4.6
Parents	0.6	2.8

PERCENTAGE OF ATTITUDE TO PREMARITAL SEX

	Men	Women
Agree	46.3	38.8
Disagree	17.8	33.5
Indifferent	25.9	15.7
Other	10	12

Source: Survey by Insight China magazine, Beijing

TIAN CHI / CHINA DAILY

《中国日报》今天发布了一张关于中国的性知识的信息图。据数据显示，婚前性行为正越来越普遍。

根据这些由 Insight China 进行的调查显示，1013 受访者中的 71.4％表示，他们有婚前性行为。43.1％的受访者赞成婚前性行为，24.6％表示反对。

而在一项在 1989 年进行的同类调查中，只有 15％的人承认有婚前性行为。

同时，调查数据表明，互联网已成为中国人获取性知识的主要来源。而对女性来说，主要来源是性经验。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推荐阅读：大学生之开放的性观念、无畏的性态度

二十多年前，象牙塔里的大学生们“谈性色变”，恋爱要悄悄地谈，同居更如同洪水猛兽。如今，性话题成了大学生间公开的谈资，近半大学生赞成婚前性行为，不少学校设有安全套自动售卖机，学校周边的租房业务也异常火爆……

从百合网“大学生婚恋调查”的各种数据可以看出，大学生性观念越来越开放了。但同时，性知识的匮乏，也使他们存在一些健康隐患。除此之外，还可能会影响他们日后的婚姻稳定，甚至造成社会责任感缺失。所以，大学生性观念变化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值得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与思考。(本报记者 小草)

数据——

大学生性观念越来越开放

调查发现，受访学生中第一次发生性关系的年龄主要集中在 19-22 周岁；第一次性行为多发生在：旅馆、租房和家中；第一次性行为后，多数女生会有心理压力……

七成人认为爱比性重要

在“爱与性谁更重要”这个问题中，男女双方的认知并无太大差异，七成人都认为爱情高于性；但在婚姻的选择上，比较看重性；当然有将近三成被调查者认为两个都非常重要，都不可或缺。

三成人坦言尝试性行为

对于婚前性行为尝试问题，33.5%的大学生情侣坦言尝试过，而 27.6%的人想尝试还没行动。想尝试还没行动者中，男生的性需求大过女生，男生是女生的三倍多。而不想尝试者中，女生是男生的三倍多。

五成人的“性动机”是好奇和欲望

在“如何看待大学生婚前性行为”的问题调查中，50.3%的女生和 55.8%的男生认为是“好奇心或是欲望驱动而发生性行为”；38.3%的女性和 31.4%的男性认为“为性而爱是不道德也是不负责任的”；但也有 25.0%的女性和 40.4%的男性认为“只要双方相爱，就可以发生性行为”。

对于同性恋，持中立态度居多

“同性恋”这一词语，近年来越来越多进入大众视野。对于这一性取向，大学生们更多表现出无所谓的中立态度。“中立，但自己不会尝试”的答案，代表 62.6%女生，52.8%男生的态度；明确表示“不正常”的有 12.5%的女生以及 28.5%的男生；16.7%的女生和 10.4%的男生认为“很正常”。

六成人赞成校外同居

爱到情浓时，能不能住到一起?60.2%的人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不过，这里面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无条件同居，另一种是在婚姻承诺下的同居。20.1%的人选择了前者，39.9%的人选择了后者。

四成学生不了解避孕措施

在已经有性行为的学生中，对于安全套的获取，44.3%的女生和 52.9%的男生认为是到“超市便利店”；4.8%的女生和 8.5%的男生到“街头自动售卖机”；2.9%的女生和 4.7%的男生敢于去“校医院免费领取”；但还有 39.1%的女生和 22.1%的男生“不了解”；6.0%的女生和 5.4%的男生“不使用”。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推荐阅读：卫报：陌陌暴露中国人性观念与年代区分

使用社交手机应用陌陌时，中国女性希望以此交友，而更多男性只想约炮。

27 岁的网店店主陈晓哲（音）下载手机应用陌陌时，目的十分明确：“我就是想跟各种各样的女孩上床。”

为了吸引更多约会对象，小陈上传了自己宝马车的照片和在各种高档餐馆的自拍照。小陈觉得在网上约会女孩更容易，因为如果女孩是为了钱，见面时就会表现得比较羞涩。他说：“只要我能满足她们的物质需求，她们大多数都愿意跟我上床。”

中国拥有 7 亿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用户，移动领域为创新型创业提供了适宜成长的环境。移动社交应用陌陌诞生于 2011 年，它经历了与腾讯微信等中国科技巨头产品相似的成长，成为近期行业中一大成功之作。2012 年 8 月，陌陌用户达到 1000 万；截至今年 2 月，用户数量增至 1 亿，是总部位于纽约的社交网站四方网（Foursquare）的 2 倍。

用户可以免费下载陌陌，基于地理位置相互联系，进行一对一聊天或者群聊。陌陌提供在线游戏、本地兴趣小组（译者注：陌陌吧）等多种服务，但和国外交友应用 Tinder 一样，背上了“约炮神器”的名声。

23 岁的办公室行政人员张晨依（音）在陌陌上每天能被搭讪 10 次。她的头发染成栗色，身穿短版 T 恤，贴着假睫毛。小张说，男性和女性用户使用陌陌的动机截然不同，“我想多交点朋友，越多越好。如果我用陌陌和一个男人聊了一个月后，感觉对他有一定了解了，就会考虑跟他出去吃饭”。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脚步飞快，年轻一代的情感观和性观念都与他们的父母和祖辈截然不同。婚前性行为如今非常普遍，但持传统观念的人也仍然存在。

陌陌上发布的色情信息迎合了一部分用户的需要，但也招来了麻烦。全国扫黄打非办开展的最新一轮打击网络淫秽色情信息行动中，陌陌是唯一受到谴责的手机应用。新华社报道称，陌陌是一种“荷尔蒙式社交”，已经成为色情交易的揽客工具。

最近，陌陌已试图通过营销策略，洗刷自己“约炮神器”的恶名。对此，科技网站 Tech in Asia 主编史蒂芬·米瓦德（Steven Millward）表示，“是否能把年轻人的堕落归咎于陌陌还值得商榷。近期我们发现权威人士在担忧年轻人受美剧毒害的问题，这是他们维护自己道德观念的一种尝试。”

对小陈这样的用户而言，陌陌只是寻找志趣相投的人的一种方式。他说：“面对面交流时，我们都装得很傻很天真，但其实我们内心都有肮脏的想法。我还年轻，我想体验生命中最好的时光。说实话，我很享受跟不同的女孩上床，而陌陌就能实现我的愿望。”

文中部分人物使用化名。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荐书：潘绥铭、黄盈盈：《性之变：21世纪中国人的性生活》

性之变
21世纪
中国人的性生活
潘绥铭　黄盈盈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在潘绥铭教授的主持下，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在 2000 年、2006 年和 2010 年，三次对中国人的性生活与性关系进行了全国总人口的随机抽样调查。这本书就是三次调查的结果的汇总与分析。

本书深刻地揭示出，在 21 世纪的前 10 年里，中国人的性生活与性关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有一些很出乎人们的意料。本书分为多个专题，不仅包括 18～61 岁中国人的性观念、性欲、性生活、性技巧等，也包括婚外情、一夜情、找“小姐”等各种非主流的性关系，还包括 14～17 岁少年的性状况，更包括了“多元性别”与同性恋等的情况。在每个专题里不仅发布了大量的统计数据，而且剖析了这些现象的形成原因，还从性文化的高度进行了深入阐述。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主编：方可成

编辑：姚梧雨童

设计：潘雯怡，池春荣

校订：林心怡

出品人：杜婷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doc 版请发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doc+subscribe@googlegroups.com；若订阅 pdf 版请发送至 cochinaweeklypdf+subscribe@googlegroups.com；mobi 版至 cochinaweeklymob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epub 版至 cochinaweeklyepub+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此电子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是在香港注册的非牟利团体。除了 Co-China 周刊之外，Co-China 每月还在香港举办论坛，并透过网络进行视频、音频和文字直播。2012 年开始 Co-China 在香港举办面向青年的夏令营，第一届主题为「知识青年，公共参与」，2013 年夏令营的主题是“始于本土：本土、国家、世界冲撞与协商」。

Co-China 论坛网址：https://cochina.co

Co-China 论坛新浪微博：CoChina 論壇（http://weibo.com/1510weekly）

Co-China 论坛 facebook：“我在中國」（Co-China）論壇（https://www.facebook.com/CoChinaOnline）

